

Finally, they labour everywhere

for the union and agreement

of the destinies

of all countries.

The Communist Party

to conceive its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

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

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

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

制度才能达到。

无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

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郑 谦◎著

第二卷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郑 谦◎著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二卷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2卷 / 郑谦主编; 郑谦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06-8531-7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指导思想—思想史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6674号

总 策 划: 王桂科
执行策划: 何祖敏 应中伟
策划编辑: 邓祥俊
责任编辑: 应中伟
责任技编: 吴伟腾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南朗大车工业区东槿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320 000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8531-7

定价: 3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21848

目录

第一章 延伸与准备：1949 年至 1978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 1

- 一、29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1
- 二、社会主义改革模式选择的困境 7
- 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11
- 四、延伸与准备：29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 16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的“两论” 18

- 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18
- 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探索的初步展开 24
- 三、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的基本定型 29
- 四、新民主主义建国论的结晶——《共同纲领》 37

第三章 在实施《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展开 44

- 一、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44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政策上的创造 48
- 三、巩固还是过渡：一场争论所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 53
- 四、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58
- 五、新民主主义建设成就及认识缺陷 65



第四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与向苏联模式的靠拢 72

- 一、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其原因 72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82
- 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89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良好开端 99

-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100
- 二、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 104
- 三、“第二次结合”初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构想 108
- 四、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发展 118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121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正确方向 127

- 一、背离初衷的整风运动 128
- 二、“大跃进”：一种极端化的赶超战略 137
- 三、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140

第七章 在初步纠“左”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45

- 一、九个月纠“左”中的深刻反思 145
- 二、调查研究与端正思想路线 148
- 三、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151
- 四、民主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61

第八章 调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 167

-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思想路线 168
- 二、全面调整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171
- 三、七千人大会及其之后进一步深入的调整 177
- 四、经济、政治不同发展方向所导致的矛盾格局 183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 190

- 一、一种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1
-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201
- 三、实践中的“继续革命”理论 206

四、抵制与抗争：“文化大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 218

第十章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第二次飞跃”的启动 228

一、在徘徊中前进 230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确立 23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步
241

第一章

延伸与准备：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重要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①那么，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特点，应当如何概括呢？对此，龚育之曾指出，这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的时期^②。这是一个经得住推敲的论断。

一、2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重点、对象和针对性。考察这一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是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前提。根据1949年至1978年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模式选择及实践，可以把这2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1949—1952年）。新中国

^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② 参见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成立头三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全面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在经济上，从当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多种分配形式和积累形式并存。与此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处于基本适应的状态。

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以胜利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基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充分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必须的条件。它的鲜明特色，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国家并不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事业的经营积极性；实行混合经济，允许市场与计划，国营、合作和私人经济，个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并存，共同繁荣。从这些方面来看，它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和他 1921 年后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论^①，以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十分接近。就其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看，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三年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人们在惊叹这一成就时，也应十分注意这一成就由以取得的指导方针和制度设计。“在共同纲领初制订时，人们曾经怀疑我们是否真要实行共同纲领，但三年来我们真正实行了共同纲领，因此共同纲领在人民中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②

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篇章。它大大丰富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创造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典范。

^① 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环节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用商品交易代替产品分配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等等。1921 年后，列宁更多地强调越是落后国家，过渡时期越长。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6 页。

第二阶段：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53—1956年）。从1953年起，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为实现超越战略，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经济建设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社会改造方面，选择了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模式选择的角度看，如果说前三年接近列宁新经济政策模式的话，那么1953年后则是以斯大林模式为基本依据和标准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的“主要学习外国经验”^①，与苏联模式“基本一致，枝叶不同”。在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②在政治上和社会改造方面，它强调的是按照苏联模式，消灭资本主义和农业、手工业中的个体生产，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限制商品经济作用的范围和深度。这就是当时所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③，即要使私有制“逐步变为不合法”^④，“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⑤，如此等等。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⑥。所以，“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⑦。反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对列

①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④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⑥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页。



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实际上是斯大林所解释和发挥的列宁在 1920 年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思想。^① 这是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通常做法。就中国来说，其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中国化（而当时苏联模式已开始成为改革对象），也可以说是一种以斯大林模式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于党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以及巨大的创造力，这四年中，尽管在内容上主要是仿效苏联模式，但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三大改造方面。而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更有一些独特的、成功的创造（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第三阶段：改革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建设道路时期（1956—1966 年）。从 1956 年起，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大潮中，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我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苏俄模式的第一次仿效和第一次突破一样，毛泽东再次把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②。

以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历史文献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最初改革，从而使 1956 年成为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高峰。全党“以苏为鉴”，解放思想，希望在摆脱完全依赖苏联模式这个“中介”的前提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是学习外国经验，1956 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③

由于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八大前后，党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观点和方针，改革

^① 参见林蕴晖：《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见《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③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8 页。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刚刚开始的改革不可能触及传统体制一些根本性的弊端，而只能是在其基本框架内进行一些微观的、局部的、修补性的调整，即“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①。

苏联模式权威地位的动摇，为解放思想提供了空间和动力。但对于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来说，仅仅解放思想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另外一些重要条件，如成熟的认识条件、正确的思想方法，党内外的民主以及必要的经验——包括失误的教训——的积累。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缺乏，1957年后，尽管主观上有着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强烈愿望，但结果却往往是对自己经验的绝对化，或是用一种教条取代另一些教条，回归一些更为传统的观念。结果，对传统模式的突破导致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流于教条化和经验化。从形式上看，“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大胆的实验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②，但却往往是更为简单地照搬经典作家在19世纪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及战争年代的经验，甚至是从中国古代社会汲取建设未来社会的灵感，其实质是一种更为极端化了的传统模式。

1958年底至1960年间，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全党深化了对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的认识，强调了把公有制、商品经济和计划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时期，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③根据中央号召，全党认真读书，重新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通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短短几年间，全党从国情出发，注重生产力标准，对工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进行调整，同时调整党内外政治关系。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为代表的一大批涉及众多行业条例的制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② 邓小平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定、实施，中央一线领导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刘少奇对困难局面及其原因实事求是的估计，邓小平有关以能否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是否愿意等标准来决定生产关系形式的意见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孙冶方、张闻天等有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包含了中国以后改革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途径，是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高峰。可以设想，如果调整继续深入下去，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可能将提前出现。

调整是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的，所以初期更多地还是侧重于对传统体制、秩序的修复和回归。真正对传统体制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还处于萌芽状态。随着调整的深入，一些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深层问题浮出水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面临着重大选择：或是在推进调整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现第二次飞跃；或是用传统观念衡量调整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从而否定调整中出现的改革萌芽。因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①，一些传统观念仍在深层次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有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突破”^②。用这些观念甚至19世纪经典作家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衡量调整的理论和实践，来评判社会主义改革。结果，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措施、观点被当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挑战的“修正主义”。而在这样一种迫切需要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探索创新的时候，党内外民主又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而趋于萎缩。正是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调整的深入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样，一方面是逐步深入的调整和对“左”的错误一定程度上的纠正，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之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使后者的发展难以遏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出于对形势的严

① 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来看，要想理解那些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才显得迫切、才能提出的改革任务，难度更大。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大。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页。

重估计，“文化大革命”希望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所确立的“抓革命、促生产”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但也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运动中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及各种差别的限制，都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隔膜。“文化大革命”使前十年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达到极端，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虽然从形式上看它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但实际上却既脱离了中国实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歧途。

十年中党内健康力量对动乱和极左思潮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在困难的环境里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的重要环节。

“文化大革命”把那些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把一些长期使人们困惑的问题明朗化、简单化了，这又为最终纠正这些错误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①“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②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间，以批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为形式，全国、全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彻底动摇了长期束缚人们的那些传统观念，突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和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对以往艰苦探索的丰厚补偿。

二、社会主义改革模式选择的困境

一个久经考验、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大党，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2页。



历经种种曲折终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集体，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 29 年中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己任的大党，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 29 年却未实现第二次飞跃？众多原因中，有两条似应引起特别注意，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的延误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来说，1956 年是开始大规模地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一年。“从 1956 年起，把各共产党同苏联连在一起作为它们唯一营养来源的那条脐带断了。各党于是开始了制定自己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态度。”^①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多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人们不再谈论有什么独一无二的领导了，相反，人们在谈论由于走不同道路而取得的进展。”“苏联的模式不能，也不应当再是什么必须遵循的模式了。”^② 此后，社会主义各国虽然在总体上还受到传统模式的巨大影响，但毕竟开始了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过渡。

传统模式的神圣光环消失了，苏共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削弱了，在思想解放、理论活跃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模式真空。这既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束缚和压力，为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拓展了空间，同时也失去了足以依赖和借鉴的标准答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条件的不同，对传统模式（即斯大林模式）^③ 的认识和改革必然存在诸多差异。为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参照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更多地或直接从马恩原著中寻求答案，或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世界文明中汲取灵感。不论当时的改革有多少曲折和失误，也不论其后来的发展如何，就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寻求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仍处于主流地位的苏联模式，也与 1956 年前的传统模式有所不同了。

^① 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 页。

^② 这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第二天发表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参见〔意〕贝尔纳多·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8 页。

^③ 这里有必要把斯大林模式与 1956 年后的苏联模式加以区分。虽然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后者毕竟带有一些改革的成分。

苏联等国的改革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反反复复，走走停停，步履蹒跚，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一些诸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集权、急于求成、时代问题、阶级斗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往往流于对传统体制外围部分的反复修改，满足于对计划经济的某种改良，对旧模式的核心部分更是鲜有触及。

对中国来说，1956年面临着独特的双重转型的局面：一是工作中心由革命转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是建设模式由照搬传统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双重转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较之1953年“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①时明显增加。它要求用怀疑和改革的眼光看待正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切，强调独立自主的模式创新。这既给我们解放思想、实现第二次飞跃提供了历史契机，又增加了模式选择的难度，也为一些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拓展了空间。正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以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核心理论为标准一样，在社会主义时期能否实现第二次飞跃，是以能否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衡量的。

在中共八大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在1956年后取得了新的成就，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所修正，毛泽东思想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延伸。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一种从另一个方向修正传统模式以求比它更为“纯洁”、“激进”的趋向也在发展。在60年代特别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一种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把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当成发展资本主义；把重视利润、价格、市场调节、物质利益等经济手段、缩小计划调节范围，在一定范围里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等当做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的动力……突破苏联模式的努力失去了正确方向。在这种比传统模式更极端的标准观照之下，不断加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和忧虑便在情理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的思路随之占了上风。1966年6月，毛泽东曾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变修了，不信马列了。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正是在相当程度上把传统模式或比它更为极端的模式当成评判姓“社”姓“资”的标准，而把对它的改革——其中有的的确走偏了方向——统统当成“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模式以更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1956年至1978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一种“左”——纠“左”——“左”再次发展——再纠“左”的周期性发展。这种周期实际上是模式选择困境的外在表现，反映了社会主义模式由传统到当代的转变的艰难，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艰难。

社会主义的改革，一般是在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原有模式发生矛盾时应运而生的。这种矛盾越尖锐，改革的要求越强烈，出现得越早。苏联改革是在十月革命后近四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近二十年后出现的。东欧各国，特别是那些革命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旧俄国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感到苏联模式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后矛盾更为突出。“1955年至1956年间，旧的和过时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看得很明显，并且具有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些恶果在某些生产部门内甚至已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①苏联东欧国家率先兴起的改革，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和结果。也就是说，就改革的条件来说，苏东等国家显然较我国更为成熟一些。

中国是在刚刚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进入改革时代的。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还很不发达，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得并不突出，所造成的矛盾也不及苏联东欧那样尖锐。“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②以我国当时的发展程度，虽然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改革思想，但却还不足以深刻地理解苏联东欧等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例如，在刚刚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时让人们去深刻认识其局限性；让刚刚经过三大改造高潮的人们重视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作用

^① 1957年2月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彼·雅罗谢维奇在波党中央宣传员训练班上的讲话。转引自《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以及市场经济的一定积极作用；让那些刚刚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们深刻理解它并不能等同于国家直接管理企业；让那些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只是从书本上得到一些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知识的人们，去深刻认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时党内不乏真知灼见，但终未成主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及传统文化的作用突出出来。

从改革传统模式开始，但却走上一条比它更僵化的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改革（即模式现代化）条件尚未成熟。而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内在地包含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内容。而且，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才能科学地实现中国化（本土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化^①，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时，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强调了“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当时还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年代，也就是说时代还未发生变化。所以，“在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的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②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和时代主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即当代化的问题突出出来。与第一次飞跃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必须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后才能实现。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曲折，以及我国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模式转变的曲折不过是理论发展困境的外在表现。

^① 国内外不少学者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②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 页。